

論國樂

學儒不能不知樂，樂就是音樂，是感人最深的一種藝術，但有善惡之分，善性的音樂可以調和人的七情，使歸理性，惡性的音樂則能助長人的七情，令人失去理智。孔子最了解音樂的特性，也最嚴於善惡之辨，所以主張放鄭聲，用韶舞，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

孔子正樂之後，想必有完備的音樂學理，而且照《禮記經解》所說，應該有一部《樂經》，與《詩》《書》《易》《禮》《春秋》並稱為六經。可惜自秦漢以後，《樂經》只存其名，不見其書。但《書經》和《禮記》中尚有重要的樂理，可以奉為《樂經》。

《書經虞書》記載，舜帝命夔典樂，以教胥子，使其「直而溫，寬而栗莊敬也，剛而無虐，簡而無傲簡易之失入於傲慢。以上皆教之以防其失」，又提示：「詩言志，歌永詠也言，聲謂五聲依永，律律謂六律、六呂，十二月之音氣和聲兩句言當依聲律以和樂。八音克諧，無相奪倫」。夔答舜帝，在他擊石拊石時，能使百獸率舞。這一段文字把音樂教育的目的、制作樂詞、樂譜、樂器的原理方法，及其感化的效果，都說得十分清楚，是國樂最珍貴的典籍。

《禮記樂記》，把音樂的起源、作樂的方法、以及音樂的功效說得非常詳細，研究中國文化者，尤其是研究國樂者，不可不研讀。國樂作曲，以宮商角徵羽為基本五音，這五音不只是將高低長短強弱的樂音組成旋律，而其重要的是各有所含的意義，宮為君，商為臣，角為民，徵為事，羽為物，五者不亂，則聲音和諧而不相奪，令人聽了以後，自然心平氣和，引發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。假使宮君亂，則其聲散，顯示君主驕溢。商臣亂，則其聲邪，顯示臣失其職。角民亂，則其聲慢，是顯示政虐民怨。徵事亂，則其聲哀，顯示勞民過度。羽物亂，則其聲危，顯示民財匱乏。五音皆亂，互相侵陵，名之為慢，令人聽了以後，必有五行相克五臟違和之感。這種慢樂出現，亡國的日子就快到了。春秋時鄭衛之音都很亂，已近於慢，鄭音尤其淫亂，所以孔子要放鄭聲。

《史記樂書》說，晉平公聽師涓彈奏濮上之音，未終，師曠止之曰：「此亡國之音，不可遂聽。」平公為遂所好，繼續聽完，然後問師曠，還有更悲的音嗎？師曠說：「有，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，今君德義薄，不足以聽之，聽之將敗」。平公曰：「寡人老矣，所好者音也，愿遂聞之」。師曠不得已，援琴而鼓之。一奏，便有白雲從西北起。再奏，大風至，而雨隨之，廊瓦齊飛，左右皆奔走。平公恐懼，伏於廊屋之間。晉國大旱，赤地三年。司馬遷乃說：「夫樂不可妄興也」。

《中庸》說：「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」，儒學六經都有至誠之道，研究任何一經，只要誠心求之，都會有前知之明。就以音樂而論，如能把古聖先王的樂理研究明白，便能聞樂而知其未來的結果。

春秋時，吳公子季札精通音樂，他在魯襄公二十九年，訪問魯國，因為魯國是周公之後，保存先王禮樂及各國的國風甚為完備，所以他到了魯國，就要求觀樂。當他聽了鄭風時，便認為過於細弱，沒有遠慮持久之風，將來亡國，要比別的國家早。後來鄭國滅於韓，果然比宋國滅於齊早八十九年，比魯國滅於楚早一百一十九年。吳季札觀樂，能知列國治亂興亡，《左傳》及《史記吳太伯世家》都有詳細的記載，不需多舉，以下且就《太平御覽》所引兩條論樂之事，一徵音樂之道並非普通藝術。

《唐會要》，唐高宗調露元年，皇太子李賢使樂工在東宮新作一首《寶慶曲》，命工者演奏於太清觀。始平縣令李嗣真聽後，便對道士劉概輔儼說，此樂宮商不和，是君臣相阻之徵。角徵失位，是父子不協之兆。殺聲既多，哀調又苦。若國家無事，太子將受其咎。翌年八月，太子得罪天后武氏，高宗愛莫能助，竟致廢為庶人。

《開元傳信記》，唐朝開元末年，涼州進奉新曲，玄宗招待諸王在便殿欣賞。曲終，諸王皆稱賀萬歲，獨有玄宗的大哥寧王李憲默然。玄宗問，是何緣故。憲曰：「臣見此曲宮商而少徵，商亂而加暴。夫宮者君也，商者臣也。宮不勝，則君體卑。商有餘，則臣事僭。臣恐異日臣下有悖亂之事，陛下有流離之禍，莫不兆於斯曲也。」後來安祿山造反，玄宗出奔四川，方知寧王所料不虛。

國樂的原理與諸經一樣，不能違背，違背就是離經背道，必然嚴重的傷害人心，有見識者一聽就能推知其不好的結局，歷史記載的事證太多，像李賢太子，唐明皇，吳公子季札所觀所占者，只是幾個顯著的例子而已，後世愛好音樂者不能不以此為殷鑒。

昔日卜子夏為魏文侯講解樂理，要魏文侯認明什麼是音樂，凡是正六律，和五聲，弦歌詩頌，是謂德音。只有德音才可以稱為音樂。他如鄭音泛濫，令人淫志。宋音晏安，令人溺志。衛音迫促，令人煩志。齊音倨敖，令人驕志。這些都是淫於色，而害於德，是謂溺音，不可以稱為音樂。由此可知，中國的音樂即是以美化的聲音宣揚德教，啟人德性，這是國樂的特徵，有志於復興中華文化改善世道人心者，應當大聲呼籲國人，從速認定國樂的特徵，研究國樂原理，致力復興國樂。